

白话四库全书

历代散文(一)

集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该书共收录古籍3460余种，79300余卷，36000多册，240余万页，近10亿字，分为经、史、子、集4部。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刘心莲 夏于全 主编

白话四库全书

集部 · 第五卷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话四库全书/齐豫生,夏于全主编。—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1

ISBN 7-5385-2025-2

I.白... II.①齐... ②夏... III.四库全书—译文 IV.Z.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1874 号

白话四库全书

出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电话: 5642217)

印刷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版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0

印张 260

书号: ISBN7-5385-2025-2/I·392

定价(全 30 册): 698.00 元

集部第五卷之：

《历代散文》目录

李斯

谏逐客疏 (21)

刘邦

高帝求贤诏 (23)

刘恒

文帝议佐百姓诏 (24)

刘启

令二千石修职诏 (25)

刘彻

求茂材异等诏 (26)

晁错

论贵粟疏 (27)

邹阳

狱中上梁王书 (30)

司马相如

上书谏猎 (34)

李陵

答苏武书 (36)

桓宽

盐铁论·本议 (39)

路温舒

尚德缓刑书	(43)
杨恽	
报孙会宗书	(46)
刘秀	
临淄劳耿弇	(48)
马援	
诫兄子严敦书	(49)
诸葛亮	
前出师表	(50)
后出师表	(52)
论让夺	(54)
李密	
陈情表	(54)
王羲之	
兰亭集序	(56)
陶渊明	
归去来辞	(58)
桃花园记	(59)
五柳先生传	(60)
孔稚珪	
北山移文	(61)
魏征	
谏太宗十思疏	(64)
骆宾王	
代徐敬业讨武曌檄	(65)
王勃	
滕王阁序	(67)
李白	
与韩荆州书	(70)

目 录

春夜宴桃李园序	(72)
李华	
吊古战场文	(72)
刘禹锡	
陋室铭	(75)
杜牧	
阿房宫赋	(76)
韩愈	
原道	(78)
原毁	(82)
获麟解	(83)
杂说一	(84)
杂说四	(84)
师说	(85)
进学解	(86)
圬者王承福传	(88)
讳辩	(90)
诤臣论	(91)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94)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95)
与于襄阳书	(97)
与陈给事书	(98)
应科目时与人书	(99)
送孟东野序	(100)
送李愿归盘谷序	(102)
送董邵南序	(103)
送杨少尹序	(104)
送石处士序	(105)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106)

祭十二郎文	(107)
祭鳄鱼文	(110)
柳子厚墓志铭	(111)
柳宗元	
驳《复仇议》	(114)
桐叶封帝辨	(116)
箕子碑	(117)
捕蛇者说	(118)
种树郭橐驼传	(119)
梓人传	(121)
愚溪诗序	(124)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125)
钴鉧潭西小丘记	(127)
小石城山记	(128)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129)

历代散文

散文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教科书上所讲的散文概念，除诗歌、小说、戏曲以外的一切文章均可称之为散文。

中国散文的发展史亦可谓洋洋大观，名家辈出，精彩作品纷呈，给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增添了无比丰厚的宝藏。

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开始，中国散文创作开始形成轰轰烈烈的创作潮流。先秦时代已出现了许多可为后世散文创作标本的佳作，如《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历史散文著作和《论语》、《老子》、《庄子》、《孟子》、《荀子》、《公孙龙子》、《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诸子散文著作，使散文创作在先秦时代形成了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它在多方面为后人树立了典范。有些地方更是后人难以启及的。这些著作在本书中有专节论述，此处不复赘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并在统一的大帝国内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车同轨”、“书同文”等措施，客观上推动了全国文化的交流。

由于秦代崇尚法家学说，刑法残暴，又酿造了“焚书坑儒”案，在这个仅存十多年的短命帝国中，文化的发展是可悲的，可以说这是个荒歉的年头。秦代屈指可数的文学家大概只有李斯、赵高等人。

李斯的《谏逐客书》可以堪称整个秦代文学的压卷之作。该文言辞激扬顿挫、音韵铿锵，说理透辟，颇具煽动性。

两汉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时期，它上接先秦，下启魏晋。这一时期文学开始表现出与学术脱离走向独立的

趋势，人们开始把文学与学术著作加以区分，出现了“文章”和“文学”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讲究文采辞藻的作品，后者指学术，特别是指儒学，司马相如、东方朔等是文章之士，而董仲舒、桑弘羊则属文学之士。这一分工推动了文学的深入发展。

散文在两汉时期上承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继续取得辉煌成就。汉代散文可以分为史传文和论说文两大类。

西汉初年，因秦末连年战争，社会经济极端凋弊。汉王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恢复社会经济，巩固自己的统治，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采用黄老学说，在政治上推行清静无为，没有顾得上思想上的禁锢。因此，各派学说得以并存，言论较为自由。被秦朝的文化专制摧残殆尽的论说散文便在这种土壤中重新生长起来。于是战国之遗响、大汉之新声交响和鸣，时人为之振奋。所谓战国之遗响，是说这些作品思想活跃，议论纵横，大都注重形象与文采，不同程度地带有战国散文的风格；所谓大汉之新声，是说这些作品在思想上体现了兼收并蓄，熔百家于一炉的时代特点，反映了作者对统一的封建政权的拥护和为国效劳的热情，感情充沛，气势强劲，体现了新兴的大汉王朝的蓬勃朝气。

西汉初年著名的论说散文家有陆贾、贾谊、晁错、邹阳、枚乘。贾谊的《过秦论》、《陈政事疏》、《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枚乘的《谏吴王书》，邹阳的《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体现了西汉初年论议散文的巨大成就。

西汉初年上承诸子流派的散文巨著《淮南子》内容广博，包罗万象，涉及天文、地理、政治、哲学、道德、风俗、法制、兵略等很多方面，当属杂家流派，但思想倾向上仍以道家为主，体现了汉初推崇黄老又兼容百家的思想。无论思想、内容与文学艺术成就，《淮南子》都堪称不朽之作。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

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是自成一家之作。”《淮南子》的问世，亦是汉初文坛的一大盛事。

西汉中期，伴随着帝国的空前统一强大，散文创作也空前繁荣。它们继续保持前期散文充满政治热情，有文采、有气势的特点，笔力劲健，辞气畅达，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辞赋的影响，在内容和文风上体现出三大特点：①歌功颂德为现行政策服务之作大量产生。著名的有司马相如的《封禅文》、《谏猎疏》、《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辞藻艳发，气势不凡，虽属歌功颂德，却又不全是阿谀，客观上也反映了汉帝国空前强盛的事实。②出现了一些感慨士之不遇，抒写牢骚不平的作品。随着太平盛世的到来，汉武帝加强了思想控制，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任用酷吏，滥施刑罚，实行儒法并重，文人的实际地位下降，很多作家倍受压抑，有志难伸，怀才不遇，愤懑抑郁之情时有发泄，著名的作品有东方朔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③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典雅醇厚、坐而论道的儒者之文应运而生。代表作品如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天人对策》等，充满浓厚的天论思想，道学气、学巾气很浓。

汉宣帝时期，桓宽的《盐铁论》是西汉中期一部别具一格的论说散文，书中采用了“两刃相割”、“二论相订”的方式，比较客观地记录了丞相、御史大夫之徒和贤良文学的互相诘难，不仅反映了双方的观点，而且展示了不同人物的风采和当时激烈的辩论情景。文中运用很多排比对偶句式，大量引类譬喻，尽力铺陈渲染，造成了鲜明的形象和充沛的气势。其形式和风格均带有词赋化的特点。这以后，象这样议论纵横、激切慷慨的文章就不多见了。

西汉后期，伴随着儒家统治地位的确立，今文经学盛行，政治日益黑暗，外戚专权。由董仲舒开始的雍容典雅，带有浓厚的经学和神学气息的文风在此时大盛。刘向是这种文风的代表，其

《谏营延陵过侈疏》，反复征引历史事实，深入分析利弊得失，对汉成帝不顾百姓疾苦，大规模营造陵墓进行劝谏。文章洋洋洒洒上千言，雍容舒缓，而又深切透辟，带有循循善诱的特点。明代茅坤称之为“西京第一奏疏”。他的《使人上变事书》、《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也是这一类名作。刘向之后，京房、翼奉、谷永等人也是借谈阴阳灾异抨击时政的著名作家。

刘向之子刘歆在今文经学盛行之际大力提倡古文经学，其《移让太常博士》一文是猛烈抨击今文经学和今文博士的力作，文风泼辣犀利，义辩辞刚，带有一股凌厉之气。

扬雄是西汉后期的另一著名论说散文作家，曾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解嘲》是其论说散文的代表作，该文对统治者压抑人才，造成庸夫显进，奇士难容的现象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东汉初年到章帝时期，政治稳定，统治阶级大兴儒学和谶纬之学。一方面歌功颂德之文盛行，另一方面反对谶纬之学的文章也应运而生，前者如班固的《典行》、《答宾戏》；后者如王充的《论衡》、《新论》、《陈政事疏》、《抑谶赏疏》等。王充的论说文代表了东汉前期论说散文的最高成就。

东汉后期，政治更加腐败、外戚和宦官交替当权，国有累卵之急，民有倒悬之危。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日渐荒诞，令人反感。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亦开始动摇。文人们的忧虑和不满如沸水翻腾，象班固那样的歌功颂德之文再也无法写下去了，揭露和抨击时政的作品多了起来。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崔寔的《政论》，荀悦的《申鉴》等政论文专著都是振聋发聩的名篇。李膺、陈藩、范滂、朱穆等名士亦是当时的名家手笔。他们在作品中敢于触及现实矛盾，直抒忧愤，抨击外戚、宦官，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抗争精神。

东汉散文已体现出重视骈偶和词藻的倾向。不少作品带有较多的对偶句，辞藻华美、音韵铿锵，初步具备了骈体文特征，如

仲长统的《论志》等。这直接开了魏晋散文的先声。

在史传散文方面，两汉时期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部历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这以后，中国历朝史传，无论《后汉书》、《三国志》还是其他历朝史书的撰写，没有不受《史记》和《汉书》影响的。

两汉著名的史传散文还有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范晔的《吴越春秋》，袁康的《越绝书》等，这些都对后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汉末年以迄隋朝，中国社会重新陷入大动荡，大分化时期，其间虽有西晋和隋的短期统一，但这对于长达四百余年的魏晋南北朝来说，的确太微不足道了。散文在这一长期的历史大动荡中也可谓升沉起伏，命运多舛。

东汉末年在镇压黄巾大起义过程中，各地豪强地主趁机扩大自己的力量，割据一方。黄巾起义失败后，社会又陷入了军阀混战和割据称雄的局面。文人们伤时悯乱，对社会形势的认识和了解颇为深刻。另一方面，乱世出英雄，不少有志之士很想有所作为，建功立业，结束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因此，散文创作和当时的诗歌一样也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汉末散文作者仍以“三曹”和“七子”为代表。

曹操被鲁迅称为“改造文章的祖师”。作为在动乱中纵横捭阖，逐鹿天下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主张文学为政治军事服务。因此一方面利用行政手段戒浮华，尚刑名，要求文章简略严明，突破清规戒律、直抒胸臆；另一方面，他又以文人的身份自行创作，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其文章风格自然、豪爽、坦率、通脱、无所拘忌而又自然成文，其名文《让县自明本志令》、《唯才是举诏》、《请增封荀彧表》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曹丕即魏文帝。政治上雄才大略颇似曹操，而手段上颇遭非议。但其写诗为文却颇具文人本色。其文大多为真情流露之作。《与吴质书》堪称名文。其《典论·论文》，不仅文思通畅，而且

以政治家的眼光开宗明义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文学走向自觉时代的响亮宣言。因此，称曹丕为一代文宗，毫不过分。

三曹中，曹植成就最高，曹植是曹丕之弟，兄弟二人围绕王位的继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因此其诗风和文风均以曹丕登基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深得曹操喜爱，对前途充满信心，发而为文则意气风发、辞采飞扬、锋芒毕露，如《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曹丕登基后，一连串的打击和迫害向其袭来，怀才不遇，忧生患死之情郁结于心，发而为文，不免抑郁沉重，哀婉曲折，此类文章如《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等。

“七子”中以孔融和王粲的成就最高。孔融字文举，孔子二十世孙。在当时颇负盛名，连曹操也要让他三分。他的文章代表了典型的建安文风，大胆无忌，辞气飞扬。《论盛孝章书》、《难曹公表制酒禁书》、《荐祢衡表》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王粲一生四处飘泊，饱经忧患，其文颇多忧思感慨，并以辞赋见长。

“七子”而外，蔡邕也是著名的散文作家。

魏晋之际，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权力之争是这一时期的政治主题，受政治影响，文风也为之一变，当时的散文作者主要有两派：“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以何晏、王弼、夏侯玄为代表，文章清峻简略，文质兼备，虽意在阐发道象之旨，而风格却接近法家。后者以阮籍、嵇康为代表，这些人多与魏室有宗亲、姻亲关系，愤慨于当时的司马氏专权，遂隐遁竹林，纵酒为乐，藉此不与司马氏合作。他们倡言老庄，用“自然”来反抗司马氏集团的所谓“名教”。由于心怀愤激，发为文章，也多“师心”、“使气”之作；又由于满腹忧惧，所以又多韬晦避世之作，所以整个文风可以用“愤世嫉俗，忧生患死”来概括。著名的文章有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嵇康的《养生论》、《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的《酒德颂》等。

西晋太康，元康之初，文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

称，他们慑于正始文人之祸，不敢再犯名教，只在辞藻上下功夫。文采华丽，不关心现实内容。象陆机的《吊魏武帝文》、《辨亡论》等都体现了这一特色。当然其艺术成就还比较高。

东晋著名散文作家有孙绰、许询、王羲之、陶渊明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融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在当时举世畅谈玄理的氛围中，说出“一死生为虚诞，齐彭觞为妄作”的惊人之语，堪称文章精品。

真正代表东晋散文最高水准的还数陶渊明。其文如其人，真淳自然，略无雕饰。既没有建安文风的慷慨激昂，也没有正始文风的“师心”、“使气”，更没有两晋文坛上的骈辞俪句，而纯之以平和。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指出“再至晋末乱世看惯了，纂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其著名的散文作品有《五柳先生传》、《与子俨等疏》、《桃花源记》等。

由于偏安江南的东晋及以后的宋齐梁陈等朝名士在政治上无心进取，于是文墨之事成了他们的重要寄托，而且这个时期，在文坛上颇负盛名的人大多出生于士族阶层，因而文坛的贵族化倾向特别明显。这个时期的典型作者诚如鲁迅所言“文雅的庸主”、“柔媚的词臣”，宋齐梁陈几代帝王几乎个个重视文学，而且很多身兼作者，著名的如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陈后主等都领一时风骚。由于帝王的提倡，众多词臣便云集宫廷，沈约、任昉、江总、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等都名噪一时。宫廷文人的地位决定了他们为人必定“柔媚”，相应地其文风也必然“柔媚”。适应这群贵族文人的需求，骈文便迅猛地发展起来。南朝时期的骈文形式技巧比魏晋更精巧，在句法上不仅讲求对偶，而且对仗必须工整，并分了言对、事对、正对、反对等诸多类型。句的字数也趋向骈四俪六，声律上要求平仄配合，“辘轳交往”，其他还有用典、比喻、夸张、物色等各种技巧。当时文坛上有文笔之分，而当时风尚又重文轻笔。作家们纷纷采用“绮縠纷披，

官徵靡漫”的骈体形式去写原本应由散体文去表达的内容，导致了骈文的畸形繁荣。使骈文成为南朝最具典型性的文体。除“庸主”、“词臣”外，还有几位“才秀人微”的作者，如鲍照、江淹等。他们没有门阀背景的依靠，倍感歧视和压抑，反倒因此而取得独特成就。

鲍照是刘宋时最杰出的骈文骈赋作家，他是典型的才秀人微之士，史不立传。《瓜步山揭文》、《登大雷岸与妹书》是其重要的骈文作品。齐代重要作家当首推孔稚圭。其《北山移文》寓言夸饰，妙想天开，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南朝文人之盛以梁为最，《南史·文学传序》称“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才秀之士，焕乎云集。”以君主论，梁氏父子数人，都有专集传世，且多有佳制。以宫廷文人论，彬彬之盛，一时称最，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的《与朱元思书》都是散文史上的佳作。梁朝最著名的作家当然还数江淹和庾信。二人主要成就是在骈赋方面。江淹的骈文水平代表了梁朝最高水平，而庾信的作品则是南朝骈文的最高峰。正如杜甫所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整个南北朝时期，骈文的畸形繁荣，使散体文门前冷落，但并未停止创作，在史传文学，学术著作中散体文仍然有不被遗忘的角落。这一时期著名的散体文作品有范晔的《后汉书》、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

到了唐代，中国散文发展出现了两大现象，一是骈体文秉承江左余绪继续发展，二是古文的崛起与创新。

从汉末至唐，骈文经过魏晋六朝的发展，不仅形式上已高度成熟，而题材内容上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公私文翰，均用骈文写作。入唐以后，在六朝骈文强大的惯性作用下，文风仍延续六朝老路。唐太宗文治武功，一代雄主，却不能变革六朝颓习，反而对之推波助澜，史称他为文“雕章绣句”、“韵谐全

奏”（《旧唐书·文苑传序》）。与南朝各代“文雅的庸主”无异。帝王如此，宫廷内外自然起而效之。散文在中唐古文崛起之前，唐代散文史基本上可叫做骈文史。

“初唐四杰”是唐初骈文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继承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的传统，但又有所变通，其骈文作品体现出具有唐人所特有的清新健朗的气息。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骆宾王的《讨武曌檄》都是流传千古的骈文佳品。“四杰”之外，魏征、陈子昂的《议复仇状》、《谏用刑书》等都深具这一特色。

盛唐时期，骈文又有新的发展，华丽之辞渐少，平实之辞渐多，一种宽博雍雅的盛唐气象在骈文中逐渐抬头。张说、苏颋、李华是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张说的《上官昭容文集序》、《洛阳张司马集序》，李华的《吊古战场文》等都遗响千年。

中唐时骈文大家首推陆贽。陆贽曾为德宗宰相，朝廷诏书多出自其手，和魏征一样，无意以文学名家，却以极挚诚曲畅的骈体奏议而为当代所称，对后世影响也极为深远。代表作《奉天改元大赦制》、《论裴延龄奸蠹书》等，在写作上可谓得心应手，驾轻就熟。

到了晚唐，随着古文运动的衰落，骈文再次回潮。在应用文领域几乎全用骈体，在艺术上过于讲究词藻，典雅精工，形式主义文风甚盛。李商隐、杜牧号称当时骈文大家。李商隐影响最大，善于作诔奠哀祭之文，属对精工，用典繁富，声韵严密，严守四六之法，务求典雅精工，有浓厚的唯美倾向，大受当时及后世文人称赞。但其《祭小侄女寄寄文》却不用典，不作一奥涩难解之语，只用通常文字，道小儿女生时琐事，于不经意处写起，写得情深意挚，哀婉感人。杜牧的名气相对不如李商隐，其成就主要在骈赋。

在唐代与骈文相对的是古文的崛起。古文观念的提出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渊源。概言之，它是社会上复古思潮的产物。对正

统的文人士大夫而言，三代两汉乃是他们理想的社会，三代两汉之文亦是他们理想的“古文”，而唐代偏偏并不以儒治国，所以他们就不断地鼓吹古道，提倡古文。从隋代开始这种呼声就不绝如缕。隋初李谔上疏主张复古，隋唐之际文仲子王通以道统自居来排斥异端，到陈子昂恢复汉魏风骨的大声疾呼，再到李白、王维等人在骈文鼎盛的风气下，不经意的古文佳作，都是这一呼声的连锁反应。安史之乱更使正统的士大夫们倍感恢复“古道”、“古事”的迫切，一时间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纷纷起来呼吁复古，使复古思潮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但这些人终未能形成风气，原因是他们有其意而无其文，不能以坚实的创作实绩来贯彻自己的主张。象柳冕自谓“意虽复古而不逮古”，“言虽近古，辞则不文”，典型地道出了他们的困境。其中只有元结的创作有一定的实绩。

元结能在开元、天宝之际几乎举世不为的情况下独为古文，因此被称为韩柳古文运动的真正先驱。无论其愤世嫉俗之作，还是抒情写景之作，均有佳品。但元结为人过于矫激，骂倒一切，唯我独清，辞气也过于直露，终非大家手笔。

到了唐德宗贞元至唐宪宗元和年间，唐王朝的统治全面衰退，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专权，社会上佛老思想泛滥，可以说政治、思想、经济已处于全面危机。在政治上改弦更张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以韩愈为首的一批士大夫文人趁势高举起“复古”的旗帜，主张借助儒学来振衰起废，挽唐王朝于既倒。为了宣传政治主张和儒学思想，就必须铲除文坛上盛行的雕章琢句的骈文，代之以“古文”。因而古文运动既是儒学复古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一场文体革新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韩愈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不仅大声疾呼，提出一系列理论主张，而且广招门徒，扩大影响，尔后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终于使古文运动颇具声色地开展起来。

韩愈古文运动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①文与道的统一。